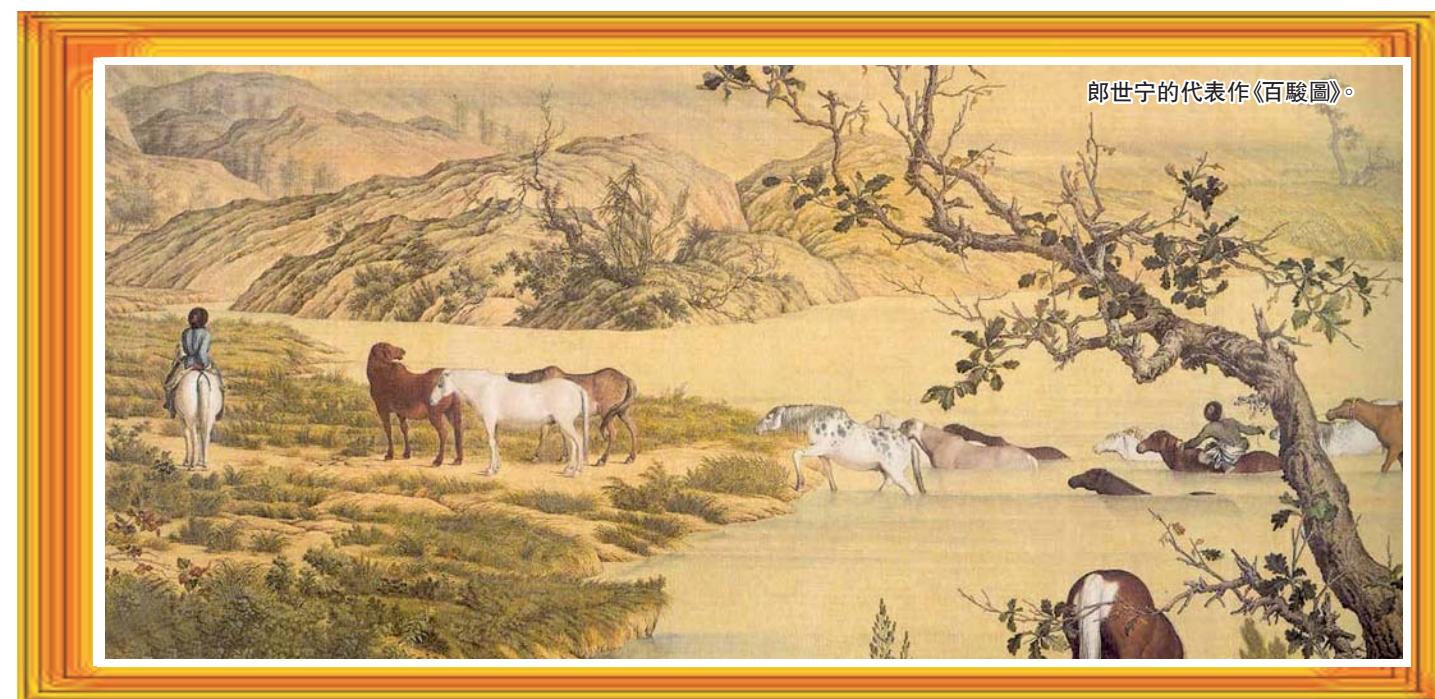


## 宮廷拂過西洋風

生長於歐美的華裔，常被笑稱為「香蕉人」，意指他們雖是黃皮膚，卻有一顆白人的「心」。而三四百年前的紫禁城裏，卻生活過一群與其「相反」的「漢魂洋才」——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西方各國的傳教士，以一技之長服務於宮廷，目的是要接近並影響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儘管，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之後，他們傳教的初衷均被現實擊碎，但社會演進的歷史裏卻深刻地留下了他們來到過的痕跡。

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郎世寧的代表作《百駿圖》。

## 漢魂洋才的「曲線傳教」

最早敲開紫禁城大門的傳教士，是意大利的利瑪竇。他於明朝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抵達北京，向萬曆皇帝進獻了40餘件「西洋玩意兒」，其中兩駕自鳴鐘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因此被准許留在京城，隨時進宮調試鐘錶。此後的十年間，利瑪竇一直請求面聖。他認為，要想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就必須設法使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成為教徒，然後利用皇帝的權威去影響他的子民。可是，直到1610年他去世時，這個願望也未能實現。

作為先驅者，利瑪竇總結出了一些在中國「曲線傳教」的經驗：穿儒服、戴儒冠，言行上向中國知識分子看齊；在頌揚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時，用西方的先進科技產品吸引中國士大夫階層，甚至皇帝的注意，創造機會對他們產生影響。這些經驗被後來人稱為「利瑪竇規矩」。

總之，利瑪竇之後，與中國統治者打交道的西洋傳教士越來越多，皇室日漸積極而慎重地收納並選用熟悉科學知識的洋人為宮廷服務。例如，精通天文曆法知識的湯若望，擔任康熙皇帝數學、力學知識老師的南懷仁，擅長繪畫的郎世寧、王致誠等。可以說，在清代，選用「漢魂洋才」已成為宮廷運作的一個基本政策，其間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長達200餘年，前後相續，未曾中斷。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明皇室還是清政府，對西洋傳教士抱持的都是「既喜又懼」的態度。統治者一方面被西洋傳教士們的學識和產品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又因西方宗教在祭天、祭祖、尊孔、男女接

觸等有關禮儀和行為規範上所持立場態度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嚴重相悖而極度抗拒之。即使一生傾慕西學、與部分傳教士關係密切的康熙皇帝也不例外，至雍正及乾隆兩朝更會發生過血腥教案和政府禁教事件。拋開這一歷史背景，便無從解讀西洋傳教士在宮廷裏的真實生活處境。

## 由「不適」到「服從」

歷經康熙盛世並終老於北京的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或許是今人了解西洋傳教士宮廷生活的最佳「樣本」。

郎世寧在康熙四十五年（1715年）抵達廣州，當年就被廣東巡撫送往京城見觀皇帝——因應康熙對待傳教士「漢魂洋才」的規定，清政府只允許有特殊專長的人進京為宮廷服務，沒有專長的傳教士只能居住於澳門、廣州，嚴禁潛入內陸身份。郎世寧在來華之前曾受過較為系統而嚴格的歐洲寫實主義繪畫技法訓練，而這實際上是羅馬教廷有目的的「人才輸出」。抵華次年，他便和捷克波希米亞人艾啟蒙，法國人王致誠、賀清泰，意大利人安德義、潘廷章等一起供職於內務府造辦處，是洋畫家當中最受寵的一個。康熙、雍正和乾隆爺孫三代都對他的西洋繪畫技藝很感興趣。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畫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畫中題到：「寫真世寧擅，繪我少年時。入室幡然者，不知此是誰。」

可即使被「重用」如斯，郎世寧也未能逃脫激烈的的文化衝突。故宮博物院1931年出版的《郎世寧畫集》中就有記載：「郎世寧欲以歐洲光線陰陽濃淡暗射之法瀚入我國，不為清帝（康熙）喜，且強其師吾國畫法。國之郎氏不能不曲阿帝旨，棄其所習，別為新體。」這種不滿在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十七日的一道諭旨中也有反映：「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陳容九龍圖一卷，宣紙一張，傳旨著交郎世寧用此宣紙仿九龍圖畫一張，不要西洋氣，欽此。」此外，他的創作也不是自由的，幾乎都是由皇帝欽定主題，多是反映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績，草稿一律送審。當時宮廷畫師鄒一桂對郎世寧的批評精準地反映了他的尷尬處境，即「學者能參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而西人也不認同郎的新體繪畫風格，批評他「所作畫純為華風，與歐畫不復相似，陰陽遠近具不可見」。

在生活中，郎世寧和其他洋人一起住在宮外的教堂，往往需要很早就動身進宮；如果到圓明園承應，路途更遙遠也更辛勞。工作條件方面，他的同僚王致誠曾有紀錄：「餘在內廷供奉繪事，勞瘁異常。其畫室僅數間平房，不可避寒暑。冬唯設一小爐，凍則呵筆從事，夏則炎熱蒸凍，室內如爐……終日遂供職內廷，實不蒂囚禁其中。」可見西洋人的生活條件並不優。

最為重要的是，作為傳教士的郎世寧，在來華後的51年中竟未有一次傳教的機會。他曾向康熙進言，但遭制止；雍正繼位後全面禁教，他更不敢冒險；乾隆朝，他再次嘗試呈上



郎世寧為乾隆皇帝所畫的人物寫真。



乾隆帝皇后畫像。

耶穌會的奏折，結果是此後每次進宮都被搜身，以防他夾帶奏折；1746年，有5名傳教士被判處死刑，他向乾隆求情開恩，「帝憮色，未予答覆」，從此未敢再提教會之事。1776年，郎世寧在京病逝，乾隆賞銀300兩為他料理後事。

## 播下現代文明的龍種

郎世寧在中國的境遇極具代表性。他和其他傳教士帶來的科學和文化豐富了帝王的生活，清朝晚期，電燈、電話等代表現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陸續出現在紫禁城裏，甚至西方的飲食及娛樂方式也被引入宮中。但是，這一切並沒有使華夏帝國與西方前進的節奏對接，宮殿裏的主人已經習慣把文明的成果當成享樂的工具。最終，西洋列強憑藉「洋玩意兒」背後所蘊涵的驚人力量造出堅船利砲打破了中國的大門。

以來華的初衷論，郎世寧們「曲線傳教」的努力是失敗的。但他們的存在，使清代宮廷成為多元文化交融匯合的最為實在的場所。西洋技藝人服務於清代宮廷實際上是一場持續一百五十餘年的藝術、科學和技術傳播和轉移過程，是清代宮廷內中西文化交流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宮廷西洋畫師的技術並不完全為皇帝所接受。郎世寧的作品通常是由他畫人物或動物，背景風光卻是由中國畫師創作。

## 國家記憶

## 高鐵碾碎舊山河



日本發行的「亞細亞號」明信片。



頭等車廂。



「亞細亞號」曾是全球速度最快的列車。

高速鐵路是經濟發達、商貿需求繁榮的象徵。但在中國，高鐵碾過的記憶並不全是美好的。與高鐵有關的慘事，近的有2011年7月發生的「溫浦線高鐵特大事故」，遠的則有1930年代華北新幹線背後的日本侵華事件。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於1934年3月1日扶持前清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新京（長春）建立「滿洲帝國」的傀儡政權，並在滿洲大興工業化建設，企圖長期霸佔華北為其永久殖民地。同年11月1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長春至大連間開通了世界上第一列流線型高速列車「亞細亞號」豪華列車；1935年3月，日本從蘇聯手中買下北滿鐵路後，又將運營站由長春延長至哈爾濱，貫穿「偽滿洲國」的幾大主要城市。

「亞細亞號」有兩大亮點。其一，它是全球速度最快的列車。當時，世界各國的鐵路運營均速為時速82.5公里，在日本國內運營的商業列車的速度更是只有60.2公里，而「亞細亞號」則達到了最高時速130公里的紀錄。其二，它從內到外的裝飾極其豪華：車身呈優美流線型，座椅為電動自動式，裝備美式冷氣機裝置……

總之，它成了日本在華北建成的所謂「現代化國家」的一張名片。滿鐵及日本、滿洲國駐各地的領事館從1935年開始發售豪華車票。一時間，日本的富豪、高級軍官、歐洲商人、外交官陸續來到滿洲國，體驗「亞細亞號」。

1942年，為了戰爭以及經濟發展的需要，滿鐵當局開始研發第二代新幹線列車，但在著手施工的第三年，隨著日本戰敗，一切修建計劃便徹底消亡了。由於太平洋戰爭局勢惡化，「亞細亞號」於1943年2月停止運行。1945年8月17日，溥儀在通化宣讀《退位詔書》，滿洲國正式滅亡。

## 人物春秋

## 張幼儀：傳統與現代之間

張幼儀晚年會將自己的人生分為「去德國前」和「去德國後」。去德國前，她身上最醒目的標簽是「徐志摩」，那代表著一段以背叛、薄情為關鍵字的婚姻。

「去德國後」是指1926年以後的時間，當時，她已經與徐志摩共同經歷了「中國歷史上依據《民法》的第一樁西式文明離婚案」，以只在中國一間女子學校受過三年教育的基礎完成了裴斯塔洛齊學院的學業而回到中國，進入東吳大學教德語。1927年後便受邀出任上海女子商業銀行副總裁，她將辦公桌擺在銀行的最後頭，這樣銀行的全景就一覽無餘；她每日九點準時來到辦公室，分秒不差。在她的打理下，女子銀行的經營狀況日益好轉，至1931年底，銀行資本總額和儲蓄資本均超過二千萬元。1934年，她又應二哥張君勸之邀管理國家社會黨的財務，成為令人矚目的新女性。

但在她的身上，傳統的婦德教育始終在發揮作用。她一直獨立撫養與徐志摩的兒子；在徐志摩去世後，她又悉心照料他的雙親，並每月寄錢資助徐志摩的遺孀陸小曼。1949年，張幼儀移居香港，1953年在香港與鄰居中醫蘇紀之結婚。婚前，她寫信到美國徵求長子徐積錯的意見：

「因為我是個寡婦，應聽聽我兒子的話。」至晚年，她還資助台灣文化界出版了《徐志摩全集》。

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一文中曾這樣描述張幼儀：「她是一位極有風度的少婦，樸實而幹練，給人極好的印象……凡認識她的人沒有不敬重她的，沒有不祝福她的。她沒寫過文章，她沒做過宣傳，她沒有說過怨懟的話，她沉默地堅強地度過她的歲月，她盡了她的責任……」



張幼儀與愛子阿歡